

绪 言

本书为《河北通史》清朝上卷，所记述和研究的是清前期河北地方的历史。

这一时期，起自顺治元年（1644年），迄于道光二十年（1840年），共196年。按其发展脉络，大致可分为顺治至康熙初期、康熙中期至乾隆中期、乾隆末期至道光中期三个阶段。

顺治至康熙初期，是满洲贵族向江南及西北汉人统治区的胜利大进军时期，直隶成为后方基地，直隶人民饱受满族统治者的残酷民族压迫和经济掠夺。

清朝定都北京前后，故明官吏纷纷降清，不少地方发生了由前明官吏、豪绅、儒生等策动的推翻大顺地方政权的变乱。明朝残余势力群起效尤，同满洲贵族相勾结，形成了极端仇视大顺政权的反革命联盟，反动气焰极其嚣张。大顺文武官员不是被捕放逐，就是惨遭杀害。与故明地方、豪绅反攻倒算、投降清朝相反，直隶人民不甘心满洲贵族的统治，以各种形式进行顽强抵抗，构成了对清朝的严重威胁，是为直隶人民抗清斗争的先声。此后，抗清斗争义旗高举，烽火不断。由于这些义军都是直隶本乡本土的农民，有深厚的群众基础，虽清军四出清剿，仍剿之不尽，杀之不绝，直至康熙中期仍有起义发生。这

些斗争尽管由于缺乏明确的政治纲领和强有力的组织，被血腥镇压，但也沉重打击了清朝统治。

为了保持和扩大满洲贵族、官员、满蒙汉八旗将士的政治、经济特权，满足其奢侈享乐，从顺治元年（1644年）起，清政府令八旗将士在直隶大规模圈地，并诱使、胁迫汉人带地投充入旗。圈地令名义上说是把近京各州县无主荒田分给东来的诸王、勋臣、兵丁人等，实际上却是大肆侵占直隶汉人住房产业，而不论有主无主。“圈田所到，田主顿时逐出，室内所有皆其有也。妻孥丑者携去，（旗人）欲留者不敢携。其佃户无生者，反依之以耕种焉。”^①“以致丁男流离，城郭为空”^②。此外，八旗贵族、官兵还借口土地瘠薄，不断新圈拨换，仅顺治四年（1647年）正月一次圈占的直隶41县肥地就多达99.3707顷，合5.9622万顷。加上以后二次圈占的民田，包括实际上已归耕农所有的故明国舅、皇亲、驸马、公、侯、伯、太监坐落在直隶的土地，共达16.6万余顷。其中有划归皇室的内务府皇庄庄田1.2万余顷，宗室庄园1.3万余顷，八旗官兵旗地14.09万余顷。虽然康熙八年（1669年）清廷已下令禁止圈地，但实际上一直到康熙二十四年清廷下达永停圈地诏令时才基本结束。在从顺治元年到康熙二十四年的40多年里，清皇室和八旗官员圈占、接受投充的畿辅民地总数约计25万顷。以后八旗兵退地领饷，直隶还有13.891972万顷土地被圈占。被圈占土地上的农民失去了祖祖辈辈辛勤耕耘的土地，也失去了房屋、家具、牲畜，只好卖妻弃子，流落异乡。

在大肆圈占土地的同时，满洲、蒙古、汉军八旗还肆行收

史惇：《锄余杂记》，《圈田》。

康熙《雄县志》卷上。

纳投充。投充者中有的是自耕农、小土地所有者。他们失去了本来就不多的土地，饱受生活的煎熬，既不甘心转死沟壑，也不敢反抗，无奈投到旗下，世代为奴。还有一些中小地主，担心自己的土地被无代价地圈占，自愿投充入旗。他们在八旗旗主的卵翼之下，既是旗主的奴仆，又是壮丁们的二地主。还有一些横行于乡村的“狡黠之徒”，先是指称别人的土地为自己的土地，冒名投充，然后又倚仗旗主特权，为非作歹。满洲旗下的庄头、奴仆也狐假虎威，凭借着主子的权势逼迫别人投充。总计，带地、无地的投充人共 49943 丁。大量国家的土地以投充的形式转到了旗主手中，清朝的赋税收入明显减少，亏空自然转嫁到无地、少地的农民身上，导致农民大批逃亡。清政府虽也下令禁止投充，但满洲贵族受利益的驱动，依然故我，使禁令成为一纸空文。

清初，八旗贵族通过战争俘掠、买卖人口、强迫投充、籍没为奴等手段，占有大批奴仆。奴仆们遭受着满洲、蒙古、汉军八旗主子敲骨吸髓般的凌辱、践踏和盘剥，反抗、自杀、逃亡之事不计其数。为防止奴仆逃跑，清廷特设兵部督捕衙门，制定了残酷的惩办逃人及窝主的《督捕则例》。特别是对窝主的惩治比对逃人更加残酷，株连极为广泛，造成了社会巨大的动荡。

康熙中期至乾隆中期，是清前期直隶历史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在这一时期，由于统治者逐渐放弃了刚入关时的暴虐政策，采取了一系列与民休息的措施，清王朝进入大统一大发展的阶段，逐步形成了所谓的“康乾盛世”，直隶地区的社会经济也得到了全面的恢复和发展。

清初一系列倒行逆施，激起直隶各地农民的强烈反抗，严重地威胁着京畿的封建秩序。统治者慑于“载舟之水，反而覆舟”的历史教训，不得不在维护八旗贵族政治经济特权的前提

下，采取一些有利于发展生产的措施。难以自保的汉族农民得以在小块土地上耕作谋生。引起社会动荡不安、冤狱遍地的逃人法逐步有所松弛；清廷陆续采取了诸如把旗丁同民户共编保甲、禁止庄头增租夺佃等限制旗人特权的措施，满汉之间的尖锐矛盾有所缓和。此外，满洲统治者还实行奖励垦荒、蠲免和赈济、更名田、盛世人丁永不加赋、摊丁入地等鼓励人民发展生产的措施。

玄烨及其子孙调整政策之后，直隶的田亩和人口有了较快增长，农业、手工业和商品经济获得了较大发展。农业生产技术、耕作条件、单产等都有了不少改进和提高。高产作物水稻种植面积不断扩大。玉米种植在乾隆以后甚至推广到了口外。耐旱、瘠、高产的红薯在乾隆时引入直隶，到嘉庆、道光时直隶大多州县都有了种植。这对于提高粮食产量，缓和吃粮紧张，具有重大影响。在种植业中，经济作物棉花生产的发展也是非常突出的。清前期，直隶已成为全国最重要的产棉区之一，除宣化府地处严寒不产棉花以外，其他各府州基本上都有棉花生产。棉花的普遍种植带动了家庭纺织业的进一步发展。耕织结合的家庭手工业在直隶各地十分普遍，出现了一些著名的纺织品产地，如束鹿、高阳、南宫、景州、乐亭杨各庄、永年等。纺织技术有了明显进步，产品质量大有提高，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各种矿产得到进一步开发，特别是北部的永平府和承德、宣化等府尤为突出。制盐技术有所改进，盐产量大幅度提高，行销范围更加广泛。其他如酿酒、造纸、陶瓷、编织等也有一定发展。

随着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农业经济作物专门化与手工业行业分工的加强，商品交换进一步扩大。进入流通领域的商品十分广泛，主要是粮食、棉花及棉纺织品。由于各地水土条件有好有差，年景有丰有欠，生产情况好时出售余粮，差时购进。

直隶粮食贸易多属互通有无、调剂余缺性质。在棉花集中产区，粮食不能自给，多从外地购进。棉花贸易不仅限于本省，还行销华北各省，甚至卖到了朝鲜。商业性的果园艺业经营也较突出，出现了不少名产，如沧州枣，赵州、交河梨，肃宁、深州桃等。棉纺织品的交易在市场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远销山西、辽宁以及宣化、承德等地。由于商品生产的发展和商品交换范围的扩大，城乡市场也有了很大发展。集市分布相当广泛。在村落集市发展的基础上，涌现出了不少贸易比较繁盛的小集镇。集镇中不只是村落集那样比较单纯的形式，而且交织着生产者、消费者、经营者之间错综复杂的交换关系。交换内容和流通渠道也呈现出多样性。祁州（治今安国市）庙会已成为全国性的、以药材为主的货物集散中心。旅蒙商贸易的发展，不仅给口外蒙古地区带去了货物，还带去了商品经济的影响。使蒙古地区单一的畜牧生产的经济形态，逐渐向以畜牧生产为主，兼有农业、手工业和商业贸易等多种成分的经济形态发展。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商品经济的活跃，资本主义萌芽也在缓慢生长着。由于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发展，农村贫富分化的加深，以及农民人身依附关系的松弛，已有越来越多的破产者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流向他处。这些人有的从事商业贩运和手工业，大量的受雇于大地主和手工工场主。无论农业还是手工业，使用雇佣劳动的现象相当普遍，使用雇工的规模也较大。有的人当雇工不仅仅局限在本地，而且还到达很远的地方。适应普遍存在的雇佣劳动，各地还出现了雇工市场。

同明代相比，清前期直隶发展的最大特点是口外地区得到了开发。清初，直隶口外东部分别属于内蒙古卓索图盟和昭乌达盟。康熙初年，清廷将察哈尔八旗由义州（治今辽宁义县）西迁至宣大塞外。直隶口外西部属于察哈尔正黄旗（一半在直

隶)、镶黄旗、正白旗、镶白旗、正蓝旗。禁止圈地之后,允许在口外为无地旗人划拨土地,一批八旗官兵和宗室庄田纷纷设立。与此同时,直隶和山西、山东大批逃荒的汉族农民也蜂涌出口,到那里垦荒和经商,逐渐成为口外居民。满、蒙、汉族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互相交流,互相融合,共同开发,使昔日的“龙沙雁碛之区”,一步步变成了“筑场纳稼,烟火相望”的农牧业基地,崛起了以张家口、承德为代表的城镇。交通、商业交流也进一步发展。通过清政府开拓的喜峰口、古北口、独石口、张家口等 4 条驿路,直隶与黑龙江齐齐哈尔,内蒙古各盟、旗,外蒙古恰克图、库伦、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等地联系起来,一直远达新疆南北、沙俄等地。随着口外经济文化的发展,行政机构的设置也逐步完善,奠定了今天河北行政区划的格局。

乾隆末期至道光中期是清前期直隶历史发展的第三个阶段。这一阶段是清王朝由盛转衰的阶段,社会矛盾日益激化,人民斗争此伏彼起。

同历代封建王朝一样,清代社会矛盾激化是人祸与天灾交相煎迫的结果。人祸之中,最为严重的是皇帝的奢侈。清代皇帝的生活相当奢侈,以弘历(乾隆帝)为最甚。他的居所陈设、日常饮食、生日铺张,都是榨取的民脂民膏。其次是官吏的贪黩。上至朝廷大臣,下至督抚司道州县,贿赂公行,层层剥,象无数吸盘吸在老百姓身上,使得人民生活极为困苦。第三是土地兼并严重。直隶是清朝的心腹重地,是满、蒙、汉八旗勋贵聚集的地区。他们大肆圈占土地,倚权仗势侵占民田,形成了旗庄密布,田连阡陌。而大批农民却成了无立锥之地的无业游民。顺、康时期,直隶的水、旱、蝗、雹、风沙、霜冻等自然灾害相当频繁。乾隆中期以后,因政治腐败,贪官如蚁,农

民的贫困破产，使人们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更低，水、旱、蝗灾猖獗。

由于受皇帝奢侈、官吏贪黩、土地兼并以及严重自然灾害的交相煎迫，直隶人民生活极其痛苦。爆发了抗粮、夺粮、反科派等多种形式的反抗斗争。秘密宗教得以进一步传播，并成为农民起义的一种组织形式。特别是以林清、冯克善、李文成为首的天理教起义，林清一支攻入紫禁城，直逼隆宗门，极大地震撼了清朝的统治。

清前期社会经济的发展，为封建国家积累了雄厚的财力、物力，也为统治者大兴土木、营造宫殿、园苑、陵寝提供了物质条件。于是，直隶境内崛起了三处规模宏大、气势雄伟的建筑群，即清东陵、清西陵、避暑山庄和外八庙。这三组建筑的规划、设计和施工，既继承了前代的优秀成果，又因地制宜，有所发展和创新，是清代辉煌建筑艺术的代表。

这一时期，直隶还涌现出一批颇有影响的文化代表人物，如以曹雪芹、纪昀为代表的文学家，以颜元、李塉为代表的哲学家，以崔述为代表的经学家，以王清任为代表的医学家等。为培养封建官吏，用儒家思想统治人民，清政府还相当注意兴建学校，出现了一批富有特色的、以保定莲池书院为代表的教学机构——书院。清代十分重视纂修志书。顺治至道光期间，直隶纂修地方志约 300 种，保存了大量珍贵资料。

在清代前期直隶的发展史中，直隶口外的开发具有重大意义，是这一时期的一大特点。在本书中，我们着力反映了这一特点。北京、天津在清代属直隶省，现在则直属中央，在编写本书时，我们尽量以现在的行政区划为准，选材侧重河北，有关京、津史料不用或少用。

本书由袁森坡、吴云廷合作编写。第一章第一、二、三节，

第二章，第三章第三节，第五章第一节一目，第六章第三节，第七章第一节第一、二、三、四目、第二节由袁森坡编写；第一章第四节，第三章第一、二节，第四章，第五章第一节二目、第二、三节，第六章第一、二节，第七章第一节二、四目，大事年表，由吴云廷编写。《绪言》为二人共拟。

由于时间及作者水平的限制，书中难免有材料遗漏、选择不准和推论错误之处，敬祈读者提出宝贵意见。

第一章 清代前期对直隶的统治

第一节 山海关之战与人民的抗清斗争

一、山海关之战

国内政治形势的剧变 顺治元年 1644年 三月十九日 明朝灭亡，国内政治斗争的形势迅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来农民起义军、明朝、清军三种势力长期角逐，农民军和清军都是以明朝为对手，清军与农民军虽然没有直接联系，但清军历次入关作战时都避免与农民军发生冲突。为了削弱明朝的军事力量，清朝还幻想与农民军结成共同消灭明朝的军事联盟。这年正月，内蒙古鄂尔多斯封建主向清朝奏报：“中原流寇势愈披猖，攻陷陕西郡县，渐逼边境。”清摄政王多尔袞立即遣使西行，以大清国皇帝的名义，向已经“西据明地”的农民军致书：“欲与诸公协谋同力，并取中原，倘混一区宇，富贵共之矣。”^①以后，清朝的态度骤变，因为清朝认定明朝的统治已是无可救药，农

^①《清世宗实录》卷 3；《明清史料》丙编第一本，第 89 页。

民军才是与清朝争夺天下的主要敌人。是年四月初，盛京还没有听到明朝灭亡的消息，清大学士范文程即向多尔衮上书，建议多尔衮立即挥师入关，先占领河北。不久，农民军占领北京的消息传到盛京，多尔衮将在盖州（治今辽宁盖县）汤泉养病的范文程召回盛京参与决策。范文程认为，应当利用明朝地主阶级对农民军的仇恨情绪，立刻进兵。范文程的两次献策，均被多尔衮所采纳，成为清兵入关时的大政方针。多尔衮旋调动清军，准备进入中原。

农民军政策的重大失误 清军虎视眈眈，准备向关内进发。这时，占领北京城的农民军领袖们却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看不到清兵大举入关已迫在眉睫，看不到满汉地主阶级相互勾结、联合进攻的危险，忙着筹办登基大典。将领们也占甲第、贪钱财、讲排场、求享受，以至于斗志低落，军纪涣散。在斗争的策略上，农民军对贵族官僚追赃比饷是必要的，但被拷打追赃的多达 800 余人，“阁臣责饷十万，部、院、锦衣七万以下，科、道、吏部五万以下，翰林二万以下，部属以下各以千计，勋戚则金尽辄杀之。”^①“拷掠责 贼 赂，至灼肉折脛”^②。首恶与从恶不分，刑法太重，打击面过宽，把可以争取或中立的力量也推向了敌对阵营。不久，吴三桂煽动明朝官僚地主反攻倒算的檄文传来，形势遂急转直下。

吴三桂向清朝请兵 吴三桂原任明朝辽东总兵，驻守于宁远（治今辽宁省兴城县）。他是明末大官僚大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也是一个阴险狡诈、反复无常的野心家，“部下有精兵四万，辽民七、八万，皆耐搏战，而彝丁突骑数千，尤为雄悍。”^③李

《明鉴纲目》卷 16 《庄烈帝》。

夏燮：《明通鉴》卷 90 《庄烈帝崇祯十七年》。

③ 《明鉴纲目》卷 16 《庄烈帝》。

自成自山西经大同向北京进攻，崇祯帝令其放弃宁远，率所部救援北京。三月上旬，吴三桂放弃明朝在山海关外仅存的宁远、沙后所两城，率领辽东军民于十六日后陆续进关，暂屯于昌黎、滦州（治今河北滦县）、乐亭、开平一带。这时，李自成已兵不血刃，接受明大同总兵姜瓖、宣府总兵王承胤、居庸关守将蓟镇总兵唐通的投降，兵锋直指北京。在夺取北京前，李自成本考虑到吴三桂与山海关总兵高第共有精兵五万人（高第所部为一万人），“遂遣兵政左侍郎左懋泰偕（唐）通守山海关。通遗三关书，盛夸（誇）李自成礼贤，啖以父子封侯。”^①其时吴三桂听说崇祯帝已死，乃由丰润退守山海关观望形势，见李自成招降，乃曰：“闯王势大，唐通、姜瓖皆已降，我孤军不能自立……乃报使于自成，卷甲入朝。”^②山海关的防务，交给了唐通。一路之上，吴三桂还大张告示：“本镇率所部朝见新主，所过秋毫无犯，尔民不必惊恐。”^③为了跻身于大顺王朝的新贵之列，吴三桂表现了很高的主动性。二十四日走到永平，又过了一两天走到玉田，吴三桂听说其父吴襄被农民军拷打追赃，索饷二十万；爱妾陈沅（圆圆）又被李自成的大将权将军刘宗敏夺去，不禁怒火中烧，乃率兵杀回并攻占了山海关，击败了农民军派驻的守关将领唐通。随后，吴三桂急忙遣使向清军求援，同时宣称要为崇祯帝复仇，发布檄文，煽动官僚地主起兵叛乱。

清兵入关与石河血战 四月十二日，李自成下令亲征。十三日，李自成亲领马步二十万人出正阳门，并带明太子、定王、永王、吴襄随行，以便再次争取吴三桂投降。大顺军经通州、密云、永平，十九日挥师直指山海关。

《清史列传》卷 79 《唐通》。

彭貽孙：《平寇志》卷 10。

《辛巳丛编》载《吴三桂纪略》、《平吴录》。

李自成旌麾东指，吴三桂以奉献“财帛”和“裂土”割地为条件，紧急向清军求救，请“速选精兵，直入中协、西协，三桂自率本部，合兵以抵都门”。多尔袞在给吴三桂的复信中表示：“用是率仁义之师 沉舟破釜 誓不返旌 期必灭贼 出民水火。”“惟有底定国家，与民休息而已。”显示了满洲贵族入主中原的决心和意志，又以“晋为藩王”作钓饵，劝吴三桂投降。二十日清军到连山，吴三桂求救的使者相望于道，凡往返八次。四月二十一日，李自成率大军杀奔关下，吴三桂率军列阵于石河以西，自上午辰时鏖战至下午未时，农民军突破吴军西北角，数千骑飞驰至西罗城北，奋力登城，守城吴军发炮轰击，农民军暂时收兵。这天李自成又派唐通率二万人从关西一片石出口，绕道夹击东罗城，防止吴军向关外逃窜。吴三桂极为恐惧，遣使请多尔袞速进，多尔袞遂星夜驰过宁远，次沙河，距关十里。吴三桂又派人向清军飞报农民军已出边立寨，多尔袞乃令诸王出击，清军勇将图赉率满洲前锋军飞驰至关外，击败唐通马兵数百人，斩百余人。二十一日深夜，清兵疾驰至关外二里的欢喜岭，高张旗帜，休息士卒，观望形势。

四月二十二日，吴三桂军与农民军再次激战，农民军集中兵力攻打北翼城和东罗城。上午，吴三桂与山海关劣绅吕鸣章等五人骑马到距关二里多的欢喜岭上之威远城，敦请多尔袞入关。这时，吴军已不支，北翼城守军向农民军投降。多尔袞遂分兵三路入关，英王阿济格率左翼从西水关入，豫王多铎率右翼从东水关入，多尔袞亲率重兵由关中门而进。时农民军自北山至海横列布阵，多尔袞见清吴联军人少，乃令鳞次而集，对农民军阵尾布列，而以吴军居右翼之末。多尔袞先令吴军与农民军厮杀，一是考察吴军投降的诚意，二是养精蓄锐，以逸待劳。当吴军与农民军杀得难解难分之时，清军以白标为号，从

吴军阵右突出，向农民军中坚扑来，只见白标如风发潮涌，所到之处，无不披靡，农民军主将刘宗敏中箭坠马，负重伤败遁，其他将领也多受重伤。农民军首尾不能相救，败溃之中，自相蹂践者数万人，横尸遍野，沟水尽赤。

大顺军撤出直隶 是夜，李自成驰归永平，收集散亡、余兵渐集。二十三日，多尔袞命吴三桂率满汉精兵 1 万人追击，在永平红花店，李自成再战，又败；乃杀吴襄于范家店。二十六日，李自成退回北京，二十七日，于王府二条胡同捕吴三桂一家³⁴口，绑至城上枭首示众。二十九日，李自成于武英殿登基称帝。三十日从齐化门撤出北京。清军除派出一万精兵随吴三桂追击李自成外，大军随多尔袞向北京进发。二十三日，进至北山山麓，二十四日，师次新河驿，二十五日，明抚宁县知县侯益光跑出城五里迎降；二十六日，清军抵达昌黎县；二十七日，到达滦州，“滦州民人均剃发迎降”。二十八日，师次开平卫；二十九日，至玉田县；三十日，至丰润县公罗店，明副将赵国祚率三千人投降，遵化、蓟州、通州官吏纷纷迎降。

李自成退出北京后，命谷大成及明降将左光先率万骑殿后，沿途抛弃金银衣物以缓清兵追师，自芦沟桥至固安百里之间，逃散了数万人。农民军在保定旋师还击，不幸失利；初三日至定兴再次返回阻击，谷大成战死，左光先伤足坠马，再败，溃降万余人，李自成乃屯兵于真定（今正定县），决心消灭吴三桂，又败，大将三人战死，牺牲万余人。李自成回真定调兵再战，双方死战一日未决胜负，李自成中箭坠马，两骑掖之急驰回营，遂自井陉撤出河北。五月六日度固关进入山西。在平阳（治今山西临汾市）分兵把守诸隘，吴三桂追至固关撤回北京。

在关系到大顺政权兴衰的这次决定性战役中，农民军领袖在战略和策略上都比清摄政王多尔袞略逊一筹。比如，清军剑

拔弩张，要从农民军手中夺取中原的目的性十分明确。因而在争取汉族地主阶级支持、严格军纪等方面都作了全面的相应的调整。而农民军领袖对清军入主中原、清军勾结汉族地主阶级反攻倒算的危险性几乎毫无思想准备，所以没有派农民军劲旅镇守山海关，仅派了唐通的降卒八千人。吴三桂一旦投清，雄关随即落入敌手，为清军敞开了入主中原的大门。在山海关之战时，唐通先已在关外败于清军，但李自成决战时对清军的猝然进攻准备不足；战败后又因军纪荡然，归陕心切，不能切实地固守北京，胜利果实遂落入清军之手。

此后，直隶人民即在清朝统治之下。

二、人民的抗清斗争

清朝定都北京 山海关之战后，多尔袞率清兵向北京进发。一路之上，抚宁、昌黎、滦州、开平、玉田、蓟州（今天津蓟县）的故明官吏纷纷开城投降，没有遇到任何抵抗，五月二日，多尔袞由朝阳门进入紫禁城。由于范文程、洪承畴等人的谋划，多尔袞采取了一系列笼络汉族官僚地主阶级的措施。九月十八日爱新觉罗·福临（顺治帝）由盛京迁都北京，十月初一日，在满蒙汉贵族地主阶级的拥戴下，于皇极门即皇帝位。北京遂成为清代统治全国的政治中心，直隶遂成为畿辅重地。因清朝没有设南京，所以北直隶就称为直隶省。

直隶地主阶级的反攻倒算 清军入关后，随着吴三桂的降清，大顺农民军的败北，直隶不少地方发生了推翻大顺地方政权的变乱，策动者都是前明的官吏、豪绅、儒生。是年四月二十七日，前明御史赵继鼎、卢世澂、大学士谢陞之弟谢陞（生员）等人在靠近直隶的德州举起叛旗，推举明朝宗室朱帅 猷为盟主，号称济王，杀害大顺政权武德防御史阎杰、德州牧吴征

文，以“济王”名义传檄附近州县，号召叛乱。于是，直隶所属沧州、兴济、吴桥、景州、东光、青县、冀州（治今冀州市）、河间、任丘、肃宁、阜城、武强、清河、故城、武邑、交河（治今泊头市）、献县等地的明朝残余势力群起效尤，相互勾连，暗通声气，这些地方的大顺文武官吏不是被捕被逐，就是被残酷杀害。如大顺政权委任的故城县令梁盘石，武邑县令马麟生，献县县令王日都、典史曹怀真，清河县令李擎柱，景州牧吴传第等人，在叛乱中都被残杀。大顺交河县令张继善、教官朱正色，武强县令晋九锡，东光县令张斗南，元氏县令李若采等则被投入狱中。德州是冀东南和鲁西北叛乱的策源地；沧州、河间府则是直隶的两个重要据点。叛乱头目朱帅 倣 寻奉表向清朝请降，被清廷任为知州；策划叛乱的幕后人物谢 陞 被多尔袞征召入京， 陞 至京师，改命与诸大学士共理机务，兼管吏部。满洲贵族与明朝地主阶级一拍即合，形成了极端仇视大顺政权的反革命联盟。

在直隶其它各府州县，明朝残余势力如死灰复燃，也借大顺军主力西撤之机密谋暴乱，反动气焰极其嚣张。在涿州（治今涿州市），前明大学士冯铨、知州张锦、参将朱万祺等人纠集地主武装，杀害了大顺政权派遣的李都尉和守军，归附清朝。冯铨旋被召入京，任命为大学士，参预机务。这个阉党的头面人物在前明被投闲置散多年以后，又沐猴而冠，位列枢垣，其感激涕零，矢志报效的心情，是不言而喻的。四月三十日，大宁都司神维显等，听说大顺军西撤，起兵击杀未撤退的农民军，以迎清军。五月三日，定州“土人”杀害大顺政权定州牧董复。五月五日，前明吏部尚书田唯嘉在饶阳策动叛乱，于城隍庙召集土豪劣绅设誓起兵，缚大顺县令，夺取了政权。五月初，遵化巡抚宋权、总兵唐钰起兵杀害大顺守将黄锭、马应湖，擒获防

御使潘跃龙、同知张耀然、县令李廷瑗。清军入关，宋权等人籍所部以降命巡抚如故”。^①五月初，前明真定府同知在大顺军向山西撤退之际，煽动真定的绅衿军民，残杀大顺军余部，占领了城池。五月八日，明宣府巡抚李鉴等起兵杀害大顺军守将、权将军黄应选等 15 人，以宣府降清。到六月时，多尔袞在致顺治帝的表文中踌躇满志地写道：“自大同以西、黄河以北尽皆底定，燕京以南、顺德（治今河北省邢台市）以北，俱已来归，疆域日扩，一统有基矣。”^②

直隶人民的抗清起义 清定都北京后直隶人民以各种形式反抗清朝的统治，构成了对清朝的严重威胁。清兵部侍郎刘余裕在顺治元年七月惊呼：“近畿土寇，虽然革面，不闻革心，乌合时逞，处处而是。”^③此时“畿南未定，土贼蜂聚，若大名之开州、内黄，正定之井陘、获鹿，保定之束鹿、唐、完，所在千百成群。”^④八月，清巡按直隶真、顺、广、大等处监察御史周胤也忧心忡忡，他在上摄政王启本中写道：“真定重镇，无宿重兵，窥关犹多伏莽之戎，百姓时虞风鹤之虑。臣目击情形，心切危之。至顺、广两府，贼首虽有新获，寇党时复鸱张，县官十缺八九……最可虑者，莫如大名府，贼盗充斥，公然无忌，前月竟攻陷开州、内黄，盘踞其中。”^⑤秋天，保定冉才美聚众数千人，据保定以南之牧山起义，清兵及地主武装联合镇压，义军矢石如雨，阻击清军，后因山寨中水源枯竭，义军饥饿难忍，不得不杀骡马而饮其血，清军乘机进攻，义军千余人战死，余

光绪《永平府志》卷 30《纪事中》。

《清世祖实录》卷 5。

《清代档案资料丛编》第 6 辑，中华书局 1979 年版。

民国重修《曲阳县志》卷 18《张运泰》。

民国《文安县志》卷 9《邵泰征传》。

多投崖自尽。这年，直隶人民的抗清斗争风起云涌，文安南海子回民张三、张四兄弟拥有三千余人，“抢掠京西石京（景）山等处富人杨文炳数家”^①。井陘义军攻平山县，杀清典史解国卿，义军紫金梁等占据赞皇县西山，坚持抗清斗争，元氏、获鹿、栾城等县农民军在封龙山聚义者亦达数千人。曲周张治邦以诛杀肆掠财帛的衙役为名，割聚二千人，屯集于河南疃。此外，宁晋泊的韩国壁、深州的于小安，晋州的马数全、冀州的郭世先、保定的李库、顺德的袁三才都曾揭竿而起，各拥有数百人乃至数千人。他们的起义虽然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强有力的领导、统一的行动而遭致失败，但也沉重地打击了清朝的统治，是直隶人民抗清斗争的先声。

此后，抗清斗争的义旗高举，烽火不断。顺治三年（1646年），大城县人刘黑虎率二千人起事，曾经进攻青县。次年，天津府的义军进攻庆云县，迫使知县张必科举火自焚。顺治五年，“深州‘土寇’马步七百余，突入阜城，屠掠官眷，盗劫篆印，杀死百余人，驱马驴携狱而去。”^②同年，白洋淀义军攻胜芳镇。安次县刘东坡部义军围攻东安城，用诱敌入瓮的办法诈败撤退，引诱清军追至落伐村西，忽然黑雾迷天，咫尺不相见，遂击败了清军。东光县义军攻占县城，击毙清主簿冯明相。顺治六年（1649年）农民军起义的更多，“献县有花和尚、鹰咀子，东光县有滚地王，沧州有王铁棒、剥皮李红，夜叉数股，各拥众数百、百数十人不等。”^③六月，高阳县义军李小州率众攻县城东西两门，知县祖大成登城楼守御，被炮震死^④。是年，农民军

民国《文安县志》卷9《邵泰征传》。

康熙《河间府志》卷19《兵变》。

民国《青县志》卷12《兵事篇》。

光绪《保定府志》卷39《前事录》。